

非理性主义是德国法西斯的思想前驱

吴友法

德国法西斯之所以在德国兴起,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即为法西斯兴起提供土壤条件之外,还与德国历史上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非理性主义反动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非理性主义是法西斯的思想前驱。法西斯主义不但是非理性主义的延续,而且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

20世纪初,德国继承下来的历史和文化,有激励民族奋进的火花,也有导致德意志民族后退的阴霾。从近代开始,德意志民族不仅产生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巨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还有不少饮誉世界的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如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诗人兼思想家海涅、歌德,剧作家兼诗人席勒,音乐作曲家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李斯特和瓦格纳,都诞生在这块美丽的国土上。德意志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曾经以自己非凡的成就,在近代世界舞台上流光溢彩,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一方面是德意志民族在逐渐产生和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思想体系外,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以对传统理性主义和思辨哲学反动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流派。在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人们企图用符合辩证法的合理性的法则去解释社会和历史。然而,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没有完成民主革命和统一德国的任务,随之在德国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的非理性主义浪潮,并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变为统治的思潮。

这一思潮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天启哲学家谢林、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基尔克戈尔、尼采,生命哲学家狄尔泰、席美尔、史宾格勒,以及种族主义者H·S·张伯伦。非理性主义尽管在德国各种不同的哲学和思想流派,如天启哲学、唯意志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方法论上抛弃辩证法。他们在破口大骂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否认理性思维能力,认为理性不能揭示宇宙万物的本质和真理,并大肆攻击理性,说理性是无力的、非人的,是现实一切矛盾的罪魁祸首,宣扬意志、欲望、直觉和盲目力量。他们宣称人的内在意欲是世界之本、宇宙万物之实在,这个“本”和“实在”必须通过人的心理体验、人的直觉去把握。谢林晚期的天启哲学、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是德国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和思想流派的典型代表和理论根源。

谢林是“绝对”创世说狂热鼓吹者。他认为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都来源于“绝对”,“绝对”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在这一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中,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都溶合为一,成了“绝对的同一”、“无差别的同一”,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源于“绝对”、“无差别的同一”。他的这一从“绝对”或“无差别的同一性”中产生万事万物的思想,实际上是

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绝对”或“无差别的同一性”只不过是上帝的别名。由于谢林在通向现实殿堂的入口处逐渐丢掉了他曾理性地加以揭示和说明的工具——辩证逻辑，只剩下形式逻辑这一认识工具，并把世界看成是无规律的纯粹本能的直觉，使其政治观点逐渐走向反动。在晚年，他大肆宣扬信仰高于理智、宗教高于科学的神秘主义的天启哲学，认为世界来自上帝，又以上帝为归宿。他说，天启必须由一个独立于天启的事实来证明，“但是这种独立于天启的事实，恰恰就是神话的出现”^①；“对于自我来说，要求有一个理性以外的上帝”^②。这种哲学实际上是“蒙昧主义的象征”。

如果说谢林哲学只是德国非理性主义的发端，那么叔本华哲学则为德国非理性主义铺平了道路，是德国非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并开始发挥了德国哲学的灾难性作用。叔本华成为德国极端反动派的思想带头人。

叔本华是一位唯意志论的狂热鼓吹者。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渊源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尤其是康德的意志高于理性的思想和印度佛教哲学的悲观厌世主义。他认为现象即观念，人所认识的世界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主体制约的，即“世界是我的表象”，一切客体都是先天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客体不能离开主体而存在。由此，他极力主张意志论，认为自然界只是现象，“意志”才是宇宙的本质。他说：“一切客体都是现象，唯有自在之物是意志”，“一切表象、一切客体、现象、可见性、客观性都是从意志而来的，意志是每一个别事物及整个世界的最内在的东西，是核心”^③，“意志这个名词象是一个魔术字眼似的，会给予我们打开自然界中每一事物最内在的本质的钥匙”^④。他强调，意志作为宇宙的本质是不能为理性所认识，理性只是意志的奴仆、工具。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人的本质也就是意志；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意志的基本特征或目的就是求生存、求生殖；由于人们利己的“生命意志”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满足的，所以人生注定是永远痛苦的。怎样才能摆脱人生的痛苦呢？叔本华认为根本的办法在于灭绝意欲，否定生命意志，最后达到人类的寂灭。这样，“在完全扬弃了意志以后，对一切还充满着意志的东西来说，剩下的只不过虚无”^⑤。叔本华这一从意志主义走向悲观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想，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迅速蔓延。

继叔本华之后，尼采的反理性主义反辩证法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进一步发展了非理性主义，把德国非理性主义推向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他认为世界无固定的规律可循，人们感觉到的只是一片混乱和荒唐的幻想，唯有意志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本质。他宣称，真正实在的东西不是确定的，是一种永恒的、难以表述的流变；流变的东西是生命，而生命本身是权力意志。他继承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是世界本体的理论，并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生命意志的本质不仅仅是求生，更重要的是表现、创造、扩张自我、发挥权力意志。他说：“生命本身在本质上就是占有、破坏、征服异国和弱者”，“它是生物的本质，它是实际的权力意志的结果，而权力意志恰恰是生命意志”^⑥；“高贵的生命意志并不是表现在可怜的生存斗争中，而是表现为斗争的意志、权力意志和占优势的意志”^⑦；而追求权力、要求统治的意志是支配一切、决定一切的力量；世界万物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历史的进程是权力意志实现其自身的过程。在他看来，万物为扩张自己的意欲而互相争斗，从而形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呈循环状态的流转变化的过程，即永恒循环说，这是宇宙的本质、实在；由于争斗，从而决定了人生是痛苦的。不同于叔本华的是，尼采不是悲观主义者，他用权力意志代替叔本华的生命意志，主张人不应压抑自己，要在痛苦中锻炼自己，扩张自己的权力，从而超越命运，克服痛苦。尼采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超越命运这一目的，只是少数“超人”才能实现。因此，他又极力鼓吹“超人”哲学，宣扬“超人”是人世间权力意志的最高体现，是人类历史的

创造者。从这些思想出发，尼采否定理性能够揭示宇宙的本质，认为理智、直观只是发挥权力意志的工具，无意识的本能、直觉比理智更重要，强调从人的内心世界非理性的心理活动中去把握宇宙万物的根本。从权力意志论出发，尼采向西方文明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喊出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他写道：“今天，我们的文明已经疲倦了”^⑧，“要找出一些异己的、可疑的事物，一切迄今被道德禁止的事物”^⑨。他认为必须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和入道主义的影响而日趋没落的西方文明，代之以所谓“权力意志论”、“超人哲学”、“种族主义和强权政治”。尼采不是德国传统的学院哲学家，他的哲学著作常常杂乱无章、语无伦次。然而，由于与传统说教多有离异之处，多有荒谬绝伦、离经怪诞之趣谈，因此，吸引不少读者，在德国有一定的流毒和影响。

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是生命哲学。生命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非理性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狄尔泰、席美尔。生命哲学完全继承了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并把非理性主义思潮推向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反动思想具有极大的社会实践性。生命哲学歪曲并无限夸大生命现象的意义和作用，认为生命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和发展动力；生命是事物的运动、变化；除了运动、生命，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存在。按狄尔泰话说，世界来源于“生命”、“心灵”；世界是“生命”、“心灵”的客观化。他说，生命本身“包含着揭示一切认识和一切思维的联系”^⑩；“认识的基本前提都已存在于生命之中，而思维不能深入它们的之后”^⑪。他们反对用经验或理性方法来认识世界，声称既反对经验主义，也反对理性主义。他们强调唯一正确的认识方法是直觉，即从生命本身去把握生命；所谓直觉是超感觉的，超理性的。这样，生命哲学的认识方法便成为一种神秘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心体验。狄尔泰宣称：“生命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东西”，“生命不可能被带到理性法官面前”^⑫。由于他们把生命解释为某种神秘的内心体验，因此，生命哲学带有浓厚的唯意志主义和神秘主义特色，是一种极端的反理性主义哲学。

值得一提的是生命哲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另一代表人物史宾格勒。他在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完全承袭了尼采的永恒循环说和狄尔泰的生命说，认为社会的一切都是历史相对的，没有科学性；“想去科学地处理历史，归根结蒂永远是一件充满矛盾的事情”^⑬；社会历史只是若干个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的循环交替的过程；每个独立的文化都有“它的童年、它的青年、它的壮年和它的老年”，彼此之间毫无联系。他认为历史文化循环的基础和主宰者则是生命。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失败和当时西欧出现的危机，看成是西方文化的没落。怎样才能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由于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史宾格勒不象帝国主义以前或帝国主义早期的生命哲学家一样，极力为资本主义辩护，相反打着社会主义旗帜蛊惑人心。因此，他主张必须建立自己独特的文明，这种文明是由“超人”式的伟人所主宰、把普鲁士精神、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化，即普鲁士社会主义。显然，他所要建立的文明，实际上是要回到威廉帝国时代，是想在思想上拯救带有容克和军国主义色彩的德意志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把它改头换面装扮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史宾格勒这一说教，实际上成了后来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工具。在20世纪20年代，信奉生命哲学的大部分人都强烈倾向于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如荣格的政治观点和法西斯完全一致。他把死亡和生存之间的界限划分在魏玛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的和平资本主义与梦寐以求的一个侵略性的普鲁士帝国主义之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魏玛共和国应该死亡，好战的帝国主义的普鲁士应该复活。希特勒后来打着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推翻了魏玛共和国，建立了以普鲁士专制主义为典范的第三帝国，完成了生命哲学鼓

吹者的凤凰。生命哲学直接导向法西斯主义，是德国非理性主义向法西斯转变的前奏曲。

绝对——意志——生命，是从谢林到狄尔泰为代表的德国非理性主义发展变化的轨迹。《理性的毁灭》一书作者指出：“德国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背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⑭从19世纪中叶开始，非理性主义为什么成为主宰德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股反动思潮？为什么说它是德国法西斯思想的先驱呢？

非理性主义是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的产物，是适应反动势力的需要而产生的。谢林和叔本华哲学主要为封建专制主义势力服务，尼采和狄尔泰哲学则主要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

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没有象法国的那样在民主革命中作为统治阶级掌握政权，而是与封建势力实行妥协。德国历史出现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情况：资本主义生产、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存在于一个继续由霍亨索伦和普鲁士容克地主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中。本来就十分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再也不敢和德国封建势力相抗衡，而是更加投入其怀抱，“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⑮。同时，德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所显示的力量、对马克思主义惊恐万状，使本来就很小的革命性几乎丧失殆尽。联邦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埃尔德曼指出：“威廉德国的资产阶级处在一直还执掌大权的保守贵族阶层和尚未参与执政的自下而上进逼的社会主义群众之间。作为一个等级来说，资产阶级没有把与贵族争夺在国家中的优势地位的斗争彻底进行下去，以达到实行议会政治的目的，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同贵族休戚相关地站在同一条阶级阵线上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社会革命思想。在德国历史上，自由资产阶级没有充分发挥作用。”^⑯这种历史现实，在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其知识分子中形成这样一种风尚：对理性的不信任、逃避现实、苟且偷安、悲观失望。谢林、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正好适应了这种情绪。于是，知识界逐渐离开黑格尔而转向叔本华，把叔本华当作伟大的“哲学家”而颂扬备致。谢林、叔本华哲学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德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的现实，并为这种妥协进行辩护，其悲观主义主要用来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

尼采哲学形成于19世纪70至80年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虽然德国封建势力在政治上一直执掌政权，但容克贵族在经济上也追求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一致，也赞成和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德国资本主义在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后得到飞速发展，容克贵族逐渐变成容克资产阶级。德国以自己独特方式迅速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垄断资本势力迅速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在经济上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由于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霸占的殖民地太少，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武力重新瓜分世界。在经济强大的同时，德国具有强烈的扩张主义势头。尼采哲学思想适应了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贪婪欲望和扩张政策。由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再次显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加之马克思主义日益传播，德国无产阶级也日益觉醒，直接威胁到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尼采哲学思想也适应了德国反动派的需要，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他们意识到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平静”的手段已是不行了，必须用强有力的暴力手段进行镇压，尼采强权政治论自然成为反动派维护其统治的有力思想武器。

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是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代过渡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产生的。除同尼采哲学一样适应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向外扩张需要外，同时也是为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辩护。这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处于动荡不定、分崩离析的状态。资产阶级需要从世界观的角度对这一现实予以解释。怎样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状态，达到维护资本主义的目的，靠传统的理性派唯心主义和抽象原则、绝

对观念，或者靠经验派唯心主义的经验和感性知识，都无济于事。生命哲学鼓吹的具有浓厚神秘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色彩的唯心主义理论比较适合为资产阶级的现存秩序辩护的需要。

希特勒称自己取得政权后的德国为第三帝国，标榜第三帝国是中世纪神圣罗马第一帝国和俾斯麦建立的第二帝国的历史延续。这一事实，证明希特勒正是继承了德国历史上的反动传统，希特勒法西斯思想继承并实践了德国非理性主义，在法西斯思想体系中完全可以寻见到德国非理性主义的踪迹。

希特勒法西斯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鼓吹专制主义独裁统治，反对民主和进步，反对革命。他极力散布强权决定一切、“强者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说什么“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都只有强者才有权贯彻自己的意志”，“谁强就是谁对”。他声称多数人参加管理的民主制度是“污浊虚伪的制度”，认为“多数人不能代替一个人，多数人常常是愚蠢而又懦弱的政策的辩护人”，魏玛议会民主制“已成为德国民族的祸根”^①。希特勒主张在德国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一切事情的“最后决定归于一人”。他把这些思想完全付诸于行动，上台后立即实行法西斯专政，取缔了共产党和其他一切政党，实行纳粹党一党专制，剥夺了德国人民一切民主权利，社会主义和民主进步遭到残酷镇压。希特勒专制独裁思想主要来自唯意志主义。

在国家观念问题上，唯意志主义的表现是宣扬强权政治，即强者统治弱者。他们认为国家是“超人”的工具，应维护等级制度，实行公开的专制统治。尼采从权力意志论出发大力鼓吹权力决定一切，反对议会民主。他甚至批评俾斯麦还不够专制，认为他实行的虚假的议会民主是不理解权力意志，说俾斯麦对哲学的理解就象“一个农民或一个新兵似的无知”^②。尼采要求在国内事务方面抛弃民主的伪装，抛弃俾斯麦所代理的议会政治。他说：“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日益增多，他们迷惑了愚蠢的欧洲，使欧洲人丧失了理智”^③。狄尔泰鼓吹的“个人心理体验”方法论，实际上是主张英雄、伟人的个人体验成为社会历史的主宰。这些思想无非是麻痹和阻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认识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并进而起来进行斗争，反映了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腐朽阶层的要求，最适合用来论证法西斯专政，自然为法西斯所接受。希特勒开展纳粹运动，就祭起了唯意志主义这个“法宝”，向他们的“至圣先师”招魂，承认自己是尼采的门徒。由希特勒发行、罗森堡主编的法西斯机关刊物《民族社会主义月报》的创刊号上就撰文宣称：“民族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基本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确定不移的英雄新道德，正是我们的东西。”^④

希特勒实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尼采的“超人”哲学，“超人”哲学在希特勒政治体制中具体化就是“领袖原则”。如前所述，“超人”哲学鼓吹“超人”是人类的精华，“一般人”应服从他、受他的奴役。希特勒也宣称：“人类的进步和文化，不是多数人所创造的，它们的基础是个人的天才和活动。”他提出要实行领袖独裁，建立领袖的神圣的权威。希特勒夺取政权后，成为纳粹党内和全国唯一的最高领袖，全党和全国都绝对服从于他，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局面。法西斯生命哲学家鲍姆莱尔大肆吹捧希特勒是“现实的”，是“生命的体现”，“顺天应人的领袖的人格，乃是整体的命运所赖以表现的舞台”^⑤；凡是领袖所愿望的，都是一种宗教启示。这样，人们必须听从希特勒的命令。法西斯在进行宣传时，完全不诉诸群众的理智，歇斯底里的制造和维持一种狂热，是一种“人的意志自由的摧毁”，实际上也是生命哲学在宣传鼓动方面的运用。

在绝对精神、强力意志和领袖原则等思想熏陶下，在德国人民中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状况：“他们将思想上的最大胆和最顺从的性格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生活中习惯于绝对服从”^⑥。这也是德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护专制主义统治，希特勒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原因之一。

希特勒宣称一切生命都在进行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只不过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只有天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他认为“德意志民族自从历史性地进入世界历史，就一直处于空间以来危机之中”^{②3}，为了民族的生存必须向外扩张，德国祖先获得的土地是“奋斗得来的”，“现在要扩张，也只有靠武力”^{②4}。希特勒法西斯宣扬生存竞争，鼓吹德国缺乏“生存空间”，要向外扩张的侵略战争思想也是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等非理性主义思想。

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后半期有着一定的影响。他们把社会学建立在生物学或人种学的基础上，把生存竞争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关系，并作为社会发展规律。龚普劳维茨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他说，社会学就是“人类的自然史”，鼓吹“用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统治势力来说明历史进程”^{②5}。所谓自然规律，就是生存竞争规律。在尼采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为反动的社会代表人物涂脂抹粉的意识形态，“生存竞争”论成为社会和道德等领域内各种反动理论的基础。尼采本人也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某些概念来解释社会现象。他说：“就思想概念来说，达尔文主义也是正确的，强大的概念吃掉弱小的概念。”^{②6}然而，尼采认为弱者在生存竞争中也可变为强者。因此，他不是一般性的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多地是主张权力意志，认为只有权力意志才能保证“超人”永远是强者。但是，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本身都强调生存斗争，尼采的“权力意志”就是追求生存的“强力的意志”，追求和统治事物的意志。他说，在自然界“大大小小的竞争到处都是为了争优势，争生存和扩张，争强力”^{②7}。席美尔宣扬用“生命力”、“生命的渴求”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也是宣扬生存竞争。

从“生存竞争”论出发，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公开颂扬战争，认为战争就是道德，是培养权力意志的手段，是生命的本质。尼采宣称“宁可为战争而牺牲善行”，“战争和勇敢比博爱所造就的价值更伟大”，“人类儿童时代的政治已经结束了，未来的世纪将是为了统治整个地球而斗争的世纪”^{②8}。他认为，只有在一个坚决执行反动的侵略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里，才能抵制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哲学就是好战哲学。生命哲学宣扬的满足“生命力”、“生命的渴求”的观点，实际上是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一切贪得无厌的侵略奢望和扩张野心提供合法的理论依据。他们认为侵略扩张是生命自身的生长要求，是合理的；战争等于生命，和平等于僵硬和死亡。这些反动思想统统成为希特勒的法宝。

为了战争必须培植军国主义精神。意志主义、生命哲学鼓吹者都把军队视为德意志民族的生命。他们强调的普鲁士精神就是军国主义精神。法西斯生命哲学家鲍姆莱尔不满足于旧式军国主义，声称战争以前的德国的军国主义，“太不是英雄主义的了”，“一个军国主义者根本就是一个文官主义化了的军人”；只有文官主义者“规定着军人精神”的地方，才能盛行军国主义；而“军人精神，在一个男性民族里，所代表的是生命形式”^{②9}。因此，他认为“政治军人”才是生命的体现。在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思想影响下，使本来就充满着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德国的军国主义精神更加强烈。威廉二世是一位极端的军国主义者，他把军队看作高于一切，认为“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③0}。重视和推崇军队是为了战争，在他身上，“‘体验战争’、享受战争之乐的强烈欲望压倒了理智、忠告或对其臣民的怜悯。”^{③1}赞扬战争，认为“战争是上帝规定的法则”、对德国来说是“神圣”的思想，在德国有一定市场。生命哲学信徒、军事作家伯恩哈迪就宣称，战争“不仅是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必需的元素，而且也是文化中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它的确可说是真正有教养的人民的生命力和生命力的最高体现”，“对德国人来说只有一个选择——‘成为世界强国，或者毁灭’”^{③2}；“坚强、健全、兴旺的民族的人口不断增多，需要不断地扩大国境，以便安置剩余人口。

但是，既然地球上差不多所有地方都已殖民化，新土地就只有靠牺牲已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来获得，也就是说，通过征服来获得。因此，战争与征服是产生于需要的法则”^⑳。相反，军国主义者认为谈论和平是没有前途的空想，是“不道德的，不人道的”。这种好战的哲学观点和思想，自然为法西斯所接受。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充满着跃跃欲试的扩张主义情绪，不能说与这些反动宣传无关。扩张主义最后使威廉帝国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

德国向外扩张、谋求霸权主义，也是其大国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所驱使。这种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与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战争和其推行的外交政策有关，即“通过建立帝国而完成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和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使帝国在列强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使德国“具有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强权国家意识”^㉑。另一方面，主要是来源于种族主义。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有民族复仇主义因素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因素是由种族主义思想所支配。种族主义是法西斯世界观重要理论基础。希特勒认为，亚利安(当代日耳曼人)人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的文化传播者，大都是亚利安人”，亚利安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造者，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他大反犹太人，说“犹太人是一种瘟疫，一种精神上的瘟疫”，叫嚣要与犹太人“誓不两立”。希特勒种族主义思想也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财产，也不是他本人独有的，在他之前的德国早就存在。

随着浪漫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种族主义在德国也就随之而诞生。在19世纪上半叶，种族主义在德国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哥比诺出版了一本《人种的不平等》一书，从而把种族主义思想提高到日益显著的地位，变成一种时髦的思想，为种族主义在德国的复活开辟了道路。他胡说，种族的“优越性一定是永远在白色人种这个最美的分支这一边，而黑色人种和黄色人种一定是永生永世连白色人种的最最渺小的民族都赶不上”^㉒，认为黑人是最低级的种族，同低级种族发生血统混杂，是任何文化的极端不幸，“历史只产生于白色人种的相互接触之中”^㉓。严格说来，种族主义是在权力意志、超人哲学、生命哲学的成果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权力意志论把人分成不同等级，认为坚强的意志指挥软弱的意志，从而形成人类的不同等级。权力意志数量多而质量高的属于上等人，反之属于下等人；前者具有“创造性的意志”，是“充实的、雄厚的、伟大的、完全的人”，后者具有“破坏性的意志”，“是残缺不全、鸡毛蒜皮的人”。他们认为等级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人种之间、种族之间天然存在的不平等的反映。尼采把兽性和野蛮说成是“超人”的真正本质，认为这种人是高贵的种族。他说：“高贵的种族骨子里就是食肉兽，就是了不起的渴望战利品和征服的金发碧眼的野兽”，“他们所到过的地方全都留下了‘兽性’这个概念的痕迹”^㉔。他主张人类应培养这种最有生命力的种族。在尼采那里，“超人”、“地球的统治者”、“金发碧眼的野兽”是一个东西；“人是一种野兽、一种超级野兽，高等人乃是巨人和超人，二者是一个东西”^㉕。尼采似乎预见后来希特勒法西斯的问世，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残酷仇视和灭绝犹太人的大量罪行，正是尼采的关于这方面的反动说教变成可怕的现实。

尼采只是一般地考察了统治种族和奴隶种族问题，但他还没有强调日耳曼人最具有优越性。H·S·张伯伦的种族主义则赤裸裸的宣扬“日耳曼人是人类最优秀民族”。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种族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也是德国反动势力与法西斯之间在思想上联系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在1899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基础》这部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种族思想。在这本书中，他极力赞美日耳曼民族，声称“日耳曼民族的优势对地球上的全部的居民

来说意味着幸福”^③。他大反犹太人，认为“亚利安人精神与犹太人精神的结合”，“是巨大的危险”^④。这本书成为德国广为流传的畅销书，一战爆发时销售数达10万册。威廉二世也是此书的热情读者，他在阅读此书后大喜若狂，称他的理论是“用魔杖给混乱带来了秩序，给黑暗带来了光明”^⑤，并在波茨坦宫会见张伯伦，此后两人关系十分密切，友谊一直维持到张伯伦去世的1927年。

种族主义在德国的直接影响是形成了“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对本民族的优越感及浓厚的民族意识，后来发展成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德国广泛受到热烈欢迎情况，瓦尔特·拉特瑙曾指出，这是由于“君主国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科佩尔·S·平森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出现的新的更有毒的民族主义而得到恢复和发扬”^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失败的民族心理的土壤中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帝国推翻后，张伯伦和希特勒也有联系。他在1923年会见了希特勒，曾这样概括对希特勒的印象：“我对德国的信仰从未动摇过，然而我的希望——我承认这一点——曾极低落。您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心情。德国在极紧迫的时刻诞生出一个希特勒。这证明它的生命力，同样证明了它的作用”^⑦。张伯伦极力主张进行泛德意志主义宣传，强调德国人统治世界的使命，认为“如果德国人不统治世界……那么它就会从地球上消失”^⑧。张伯伦的种族主义理论合乎逻辑地成为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也成为希特勒法西斯向外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德国非理性主义早就为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勾画出了轮廓，剩下的只需要把它从沙龙、从咖啡馆、从书房搬到大街上。希特勒法西斯的实践，最终把德国非理性主义推向到了顶峰。法西斯主义就是德国最极端的非理性主义。

注释：

①② 《谢林全集》第3卷第2部分第185页、第1卷第2部分第569页。

③④⑤ 《叔本华全集》第1卷，第163、165、527页。

⑥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尼采全集》，第7卷第237页、第14卷第207页、第7卷第205页、第8卷第352页、第10卷第137页、第1卷第623页、第7卷第156页、第7卷第321页、第14卷第377页。

⑦ F·F·尼采：《孤独的尼采》，莱比锡1914年版，第433页。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66、379、417、420、420、418页。

⑩⑪⑫ 《狄尔泰全集》，莱比锡—柏林1914年版，第5卷第83页、第5卷第136页、第7卷第213、261页。

⑬ 史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慕尼黑1920年版，第139页。

⑭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第12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8页。

⑯⑰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版，第6、13页。

⑱ 希特勒引语未注明出处均见《我的奋斗》。

⑳ 见勃伦蒂涅尔：《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之批判》，上海潮锋出版社1938年版，第10页。

㉑㉒ 鲍姆莱尔：《男性联盟与科学》，柏林1934年版，第90、63页。

㉓ 希特勒：《第二本书》，斯图加特1961年版，第83页。

㉔ 见拙著：《希特勒夺权备战之路》，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㉕ 龚普劳维茨：《社会学的国家观念》，格拉兹1892年版，第5页。

㉖ 康拉德·海登：《德国民社党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35—136页。

㉗㉘ 哥比诺：《人类的不平等》，柏林1935年版，第153、356页。

㉙㉚ 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第2卷，慕尼黑1900年版，第726页。

㉛㉜ 张伯伦：《书信集》第2卷，慕尼黑1920年版，第142、126页。

㉝ 张伯伦：《政治理想》，慕尼黑1926年版，第39页。

（本文责任编辑 郑传寅）